

财经
学术文库



市场秩序论

SHICHANG ZHIXU LUN

王根蓓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市场秩序论

SHICHANG ZHIXU LUN

王根蓓 著

YH 28106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市场秩序论

王根蓓 著

责任编辑 王联合

封面设计 周卫民

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译成印刷厂

装订 上海浦江装订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9

字数 225 千字

版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7—81049—071—0/F·43

定价 19.00 元

本书出版由上海马克思主义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序

如何构造良好的市场秩序,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妥善地结合起来,这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如中国这样由集中计划经济有限度地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国家孜孜探索的难题。我国由先期的改革优先的发展战略,走向现期的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为核心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协调并进的综合发展战略,标志着构造与优化市场秩序已作为我国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王根蓓同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市场秩序论》一书,将界定市场秩序、解释市场秩序的发生机制、说明市场秩序的设计原则与原理、确立市场秩序的缔造目标与途径作为研究主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显著的实践意义。据我所知,在国内以市场秩序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写成学术专著的,本书尚属首次——也可以说本书在秩序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在这个新领域中,作者提出了大量的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和观点。

追溯经济分析史,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市场秩序的研究历史始自经济学的诞生。重农学派大师魁奈首先提出了自然秩序学说;经济学巨匠斯密则以“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将自然秩序学说系统化、完善化,并开创了由纯经济世界探索市场秩序的斯密分析范式,即纯经济分析框架,这个分析范式在一个半世纪里支配着经济学家研究市场秩序的考察视野;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和制度经济学的创立,以及现代新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崛起,经济学家首次突破了斯密分析范式,形成了现代分析范式,即将纯经济分析框架改造为社会—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人们不

再将目光囿于纯经济的市场体系,而是在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考察市场秩序问题——无疑,这标志着人们对市场秩序的界说、对市场秩序发生机制的理解从广度与深度上有了飞跃。王根蓓同志就是站在这些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对市场秩序,尤其是转型经济的市场秩序进行研究的。作者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将市场秩序的探索向前推进,即将社会—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发展为社会—经济—自然分析框架。由此,作者指出,良好市场秩序的检验标准,既不是纯经济效益尺度,也不是纯社会效益尺度,而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的“天人合一”标准。尤其值得肯定的是,王根蓓同志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准确地比较西方市场经济发育时代与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发育时代的显著差别,前者可以牺牲生态效益来增加经济效益,并将生态效益侵损的代价转嫁给未开发的地区和不发达的民族,而今天,转型经济已失去了转嫁生态危机的机会——生态效益侵损的苦果只能留给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和后代品尝。故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国家应当舍弃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努力倡导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利益互惠的“天人合一”。作者在社会—经济—自然分析框架下,界说市场秩序的内涵,揭示市场秩序的发生机制,不啻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学术的创新。

岁月的流逝,不仅变革的是时间,而且也变革着思想。要准确地把握经济学家对市场秩序的理解,必须深入到他们生活的时代中去,必须确切地把握他们时代的知识积累特征与思想供给的方式。这样,思想上的的是是非非便会清晰明了。为此,王根蓓同志在构造理论市场假说时,对经济分析史上有关市场秩序的核心学说——自然秩序学说的形成原因与变迁特征进行了动态而全面的解释。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博士,王根蓓从大量的西方经济学资料中旁征博引,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一般均衡论,甚至到不久

前形成的新制度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的著作,作者无一不涉猎。然而掌握和理解这些资料与著作并非易事,王根蓓却在浩瀚的经济学文献中自如地分析与应用,足见作者学术功底的厚实和文献驾驭能力的出色。

《资本论》研究是王根蓓同志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故硕士期间的用功学习,已奠定了作者比较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首先,作者强调了转型经济发育与发展市场秩序及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是一个自然历史的演化过程,即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的和谐发展的过程,转型国家应有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完成设计与缔造市场秩序的社会改造工程,但又必须遵循市场秩序渐进演化的基本规律;其次,作者确认,斯密开创的自然秩序学说是对市场秩序的短期而静态的考察,马克思论证的有限市场经济论是对市场秩序的长期而动态的分析。我觉得这个结论是中肯而恰当的,而且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将自然秩序学论与有限市场经济论结合起来,对市场秩序发生机制作了合理界定。

的确,中国不是经济学的创始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缺乏包含卓越智慧的经济思想。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曾创造了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疑,缺少深厚文化底蕴的物质文明是难以持久的。中国人不仅曾以雄厚的物质文明令世界瞩目,而且也以丰富的哲学建树、卓越的政治见解与不俗的经济思想,作用与影响了世界物质与文化的演化进程。王根蓓同志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同时,挖掘我国古代文化宝库,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做出新的解释,尝试着把东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这种研究方式的创新,值得重视和倡导。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民族文化中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将西方思想与东方智慧结合起来,必将会拓宽市场秩序的分析视野,深化市场秩序的理论探索。

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而言,设计与缔造以市场秩序为内容的社

会变革工程的完成,只是为社会享有和平、安全、稳定、公正、效率与“天人合一”的利益构造了基本的宏观制度框架,奠定了初步的微观基础。要将这些社会变革的成果保持下来,发展下去,使转型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的市场社会,转型国家必须推进“法治”与“文治”。特别是作者指出:“法治”是现实的选择,但并不是唯一的与终极的选择,我们的市场秩序的设计与缔造工程在着眼于将市场经济纳入“法治”社会的同时,更应当着力在“法治”的基础上,构造通往“文治”的途径。所有这些论点都是很有见地的。现代西方学者也明确指出:市场的含义不能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它涉及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三个制度方面的问题。所以,对市场的评价和市场失灵的原因必须要汇总,包括它们对权力结构与人文发展的影响。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起草的《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也强调:毕竟,市场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应是人文发展的手段,市场应该服务于人类而不是人们为市场服务。可见,本书的论点是有卓越见识的。

王根蓓同志在社会—经济—自然分析框架下,对市场秩序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论点,进行了新的论证,尽管有些理论观点有待反复推敲,特别是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总体而言,作者对市场秩序的研究已有系统而独立的见解,能自成一家之言。我相信,作为一名有创见的年青学者,王根蓓同志会以《市场秩序论》一书的出版为契机,将本书已提出但未完善解决的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傅殷才

1996年3月12日于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第一章 导 言

1.1 主题的确立

市场秩序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确立这个研究主题的理由大致有两个：其一是理论分析的启示；其二则是关注现实的责任。

1.1.1 理论分析的启示

我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与把握，始自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在这段研究期间，凯恩斯主义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之间有关“政策无效力”命题的论战，最令我感兴趣。正如理性预期学派运用经济人假说与理性预期学说不足以驳倒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有效性观点一样，西方经济学家有关“政策无效性”问题的相互辩驳也难以令我信服和满意。然而对这些理论、对策、建议的怀疑与不满，使我对经济政策问题有了长期的关注与探索，也促使我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由宏观理论转向微观分析。

颇为幸运的是，我的导师傅殷才教授让我承担了国家“八五”重点课题《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公正与效率——政府经济作用”部分的研究任务。完成这项课题的需要，促使我从微观与宏观层次上对政府行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为透彻的认识与理解。然而，当做完这项课题时，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产生

了：一个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转型经济——如中国这样一个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适度转型的社会，如同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漏桶，任何经济政策投入其中，都会因其基础性的社会控制机制发育不良，或发育滞后，而导致政策的调节与整合效力从漏洞里散逸，很少达到或几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想，像中国这样的发育中市场经济的政策无效力难题是不会等同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政策无效力难题的，因而也更难以用“理性预期假说”与“理性经济人假说”来解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既要引入与塑造市场机制，又要限定与完善计划机制的转型经济国家，它不仅需要由政策创新来解决“政策无效力”难题，更需要制度创新来解决。

对“制度创新”问题的关注，将我的理论研究兴趣引向公共选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些经济学说是在政府保留其传统的社会保护功能的前提下，又以供给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功能为己任，全面介入市场经济，使西方的以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发生重大改变，政府的数量调整与经济管制带来以“滞胀”为特征的新的经济不稳定困境的背景下兴起与发展的。公共选择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代表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他们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过程投向更广阔的政治—法律过程，更深刻地认识了宏观与微观经济政策得以产生、运作的政治—法律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他们将经济政策作为政治—法律竞争过程的产物，更准确地剖析了“政策无效性”的制度原因——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问题。这些理论代表着西方经济政策研究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他们对政府行为与经济政策的研究已从政策创新的对策层次发展到制度变革的战略层次。

发达的市场经济尚且存在用制度变革来应对经济生活中的重大挑战的需要，那么，对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适度转换的转型经济，它更呼唤经济理论研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解释与医治“政策无效性”问题。正是这些学术研究的启示，使我将论文的主题定位为

市场秩序论。

1.1.2 关注现实的责任

考察经济理论的现实取向,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理论研究者学术态度的倾向性:或“趋附”现实,在学术功利至上观点的支配下,粉饰现实,注释政策,从而遗弃了经济研究的理性独立精神;或“漠视”现实,以崇尚“中立”,保持经济理论与现实政策的距离为由,奉行经济理论对现实的不介入、不参与。这两种态度无疑忽略了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经济理论若要准确而客观地描述和解释经济现实,解决经济难题和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则必然要求理论研究者力戒“趋附”或“冷漠”的学术态度,而把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与严谨的理论思考密切地结合起来。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塑造完善的社会财富增长机制与社会财富分享机制的伟大变革实践,将我们的社会引入利益整合、权利重置与文化转型的变革中;这场变革不仅要肩负政策创新的责任,而且更要承担制度创新的使命——其变革本身既是一个破除与创新旧的经济秩序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塑与构建新的经济秩序的过程。而转型时期人民最感短缺与需要的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秩序。

责任制的成功实践,融解着崇尚“大同”、以贫为荣的平均主义的坚冰,给计划机制下的僵化经济注入了效率的春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府首肯与承诺,使这个以“分权让利”为契机的利益诱导下的零星春色,汇合成绿染天涯的春天。人们以贫为辱、求强致富的利益意识萌动了、苏醒了,力争使自己加入“先富者”行列的经济竞争,给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劲活力,也汇聚成三次全民经商的经济大潮。这一次又一次由利益激励涌现的全民经商浪潮,如同约制力不足的激流,冲击和震撼着中国社会的方方

面面。

我们既看到了勤劳致富的希望与成就——人们神奇地治愈了“温饱不足”的痼疾之后,又毫不迟疑地相继实现着经济“小康”的理想;也看到了利益结构倾斜、经济差距失度和社会秩序紊乱的代价:一些偏好风险、立足权力又运气颇佳者,一些善用机会、多方流动、专营假冒伪劣产品者……在人头涌动的经济海洋中,成为经济“成功者”,率先跻身“先富者”的行列。在一个竞争起点不均等、竞争过程失公正和竞争结果欠调整的转型经济里,社会成员间经济收入的差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拉开,人们的社会地位与职业价值也随之重新定论。自然随机性与社会随机性似乎在捉弄为求强致富而奔波的人们的命运!一些人无所事事却饱食终日,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一些人整日操持、终生勤勉却看不到走出贫困泥潭的希望……人们的抱怨和不满增加,社会的谦让与合作淡化,于是违法乱纪者增多,杀人越货者萌生……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的困惑、安全的危机……社会需要在构造高效的利益增长机制的同时,培育公正的利益分享机制、良好的公共安全机制。

我们既看到了分权让利激励下的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也发现了公共权力制衡机制的衰退:那些既眷恋权力,又钟情于商人财富的人们,无遮无掩地进行权力投资——将公共权力作为私人资源,投入经济领域,成为个人财富与收入增长的工具,公共财产和国有资产也随之流失,转化成私人的资产、私人的财富……于是市场交易原则渗透、侵蚀公共权力运作的领域、运作的的能力,公共权力也操纵与扭曲市场机制运行的空间、运作的效力;于是官僚资本的恶习复生,腐败病毒在社会领域蔓延……社会在培育市场机制的同时,也需要增进公共权力的制衡机制。

一场物质利益的变迁与整合,启动了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企业、对家庭的关注与忠诚,统一

化为对财产、对收入的热情与崇拜,自我利益膨胀过度,公益精神衰退有余;热心公益的人少了,扶危济困的人少了,见义勇为者少了……社会需要文化重建与道德复兴机制。

利益结构的倾斜、权力制衡机制的退化和价值观念的扭曲,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利益冲突和心态失衡,必定会带给生活在这个不平静的变革时代的人们不少烦恼、痛苦与焦虑,也会激起人们强烈的道德义愤与行为抵触:十多年的变革,使人们经历了一个由“以贫为乐”的利益冷淡转至“以贫为耻”的利益苏醒与追求,再至“以贫为愤”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失落的心理转变过程。但社会总不能仅将认识停留在情感的渲泄层次,人们总不能靠唱“好日子已逝去”的挽歌来寻求解脱,我们必须从理性的高度对这个动荡的令人不安的社会转型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予以认识与解释;我们必须回答市场机制可以胜任什么,不能胜任什么;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什么,它是由何机制而生,又因何缘由而衰?

1.2 目标的确立

以创新原理、完善知识为己任的基础研究和以提供建议、优化对策为首要任务的应用研究是经济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论研究者或者关注基础分析,或者强调应用研究,或两者兼而有之,其取舍的关键是因研究的兴趣和主题而变动的。本文的研究大致属于基础研究:即对于社会动荡、经济问题等的求解,我们的选择不是针对现实提供直接的对策、建议,而是进行基础理论的思索——对西方经济分析史上经济学家的有关市场秩序理论的建树进行整理、总结与创新,以期对我们时代,对一切转型经济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南和方法选择。这正如对于饥饿的人,给予食物是一种直接的救济,提供觅食的工具与途径也是一种友善的援助。

1.2.1 问题的起因

在经济变革的时代,人们对经济秩序的紊乱、公共权力制衡机制的衰退和文化观念转变的普遍担忧与强烈不满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其一是由于对经济变革本身的不适应。即使完善无缺、得可偿失或得失相抵的社会变革,因它变革了社会熟悉的行为方式与利益结构,也会引致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的抵触。其二是对变革目标的不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改革取向,表明以塑造效率化的社会利益增长机制和培育公正性的社会利益分享机制为内容的变革实践,不可能是一个只有收益,没有投入的“人人得奖,个个获益”的福利同度同步增加的过程。经济变革的目标就是要革除计划体制中以平均主义为基准的利益分配和分享格局,而构建以注重效率,承认利益差别为导向的利益分配机制。其三是对变革的长期性与过程性的不理解。创新经济秩序、培育市场机制这样宏大而艰巨的社会变革工程,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没有代价、没有过程而只有收益、只有结果的工程。它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艰辛的探索与不懈的努力。

另一方面,人们对经济变革实践中的秩序紊乱的不满,也确实是因为变革自身的不完善诱导的。的确,改革者并不是先知先觉的、全才全能的圣人,变革实践的不完善有理性不充分的不可避免性。但实践的缺漏也有不可原谅的起因,这便是经济理论对变革决策的误导。计划经济运行的实绩自身破除了“计划全能”的迷信,然而,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又形成了“市场全能”的新迷信——盲从价格机制,轻信自由放任,轻视公共管制,夸大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对决策、理论对实践的误导,是我们变革中产生社会经济无序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手足无措或控制无力的主要原因。

1.2.2 治理的对策

将经济变革实践产生问题的主要缘由归于经济理论的误导,从而追究思想的责任,是否属无事生非、小题大作的无理之举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说任何一项重点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决策,它虽不能算充分深思熟虑的杰作,也不能归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既是实践选择的结果,也更是理论推论的结果——特定的经济思想必定直接或间接地为变革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也不存在一项超然独立的经济理论——它能完全地脱离实践,并对变革决策保持“中立”的沉默;相反,创立学说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们都在力图对经济变革实践、对经济变革目标与途径施加或大或小的影响力与调控力。凯恩斯曾正告人们:“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认为的力量更大。事实上,世界是由少数思想家统治的。掌权的疯子,道听途说,从若干年前拙劣的学者那里获得疯狂之念。我确信,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比起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被大大地夸大了。思想的作用确实是不能立即看到的,而要经过一段时间。因为在经济和政治哲学领域,并没有多少25岁或30岁的人还会受新理论的影响,所以,公务员、政治家,甚至鼓动者运用的思想,一般不是新的,但或迟或早,无论是好是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①

凯恩斯这段充满义愤的逆耳之言,确切地说明了理论思想这种特殊智慧的重要属性。首先,思想具有乘数效力,即某种在学术市场具备垄断力的思想理论,经运行良好的传播系统的扩散与宣传,会影响与调控千百万人的思考与行为,而且较之传统社会,已

^①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383.

步入信息时代的现代社会,其发达的通讯手段与良好的传播系统,会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来扩大思想的影响力。其次,从思想调控行为的实际结果上判断,思想产品又具备外在经济效应与不经济效应,即一种具备良好的现实解释力、解决力和未来预见力与指导力的理论思想,正确地指正人们的行为,准确地引导社会经济变革实践,从而形成社会“公益”。相反,一种缺乏严密科学论证,又缺少社会责任的理论,会误导变革实践,扭曲进取方向,从而产生社会经济的“公害”——导致经济增长的失控、社会稳定的衰退和经济秩序化的降低。尤其是日益加深的知识分工使社会成员间有“隔行如隔山”的知识生疏感、敬畏感和盲从感时,所谓专家学者的权威论调,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调控力更大,其不负责任的观点学说因而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公害”。

正是基于对思想产品特殊性的理解和对我国转型经济变革失误的思想责任的追究,我们的研究目标则为“破中求立”,即正确地评价与鉴别西方经济分析史上有关市场秩序的理论学说,并以此为参照,来阐述我们对市场秩序的理解与解说。

1.3 方法的选择

当研究的主题和目标确立之后,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选择何种分析方法和研究途径实现预定的研究目标。本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解答是:以非数量分析为主,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关注东方思想。

1.3.1 采用纯文字分析的缘由

完全地采用文字叙述型的规范分析而舍弃数量分析,是本文论证方法的第一个特色。做出这个选择,一方面是因为数量分析不

是我拥有相对优势的分析技能——这个技能对研究市场秩序这样纷繁复杂的理论问题也不具备特殊的专长；另一方面，也是对经济学数量分析过度的戒备。曾记得有这样一幅情景，它给了我极深的印象：那是一次世界学术名著的展销会，会场一旁是非经济学的名著展销处，这里人来人往，购销两旺；而另一处则是门庭冷落的经济学名著的展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声誉，诱使许多读者在此留步片刻，然而书中众多的数学符号与公式推导又使人们“望峰息心”。由于接受水平的限制，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购书的念头，面对这种热冷鲜明的对比，我们不能不对经济学发出“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的疑问。

的确，数学给了经济学明晰与精确的生命力，数量分析的成功应用提高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诺贝尔奖授予经济学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专长与优势——这种特长恰恰是数量分析赋予经济学的。数量分析使经济研究产生质的改变，当归于由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一书成功发动的经济学中的数学革命。自此，英美两国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日益强调把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知识作为理解宏、微观经济理论的预备知识；经济研究者更多地应用数学语言表达自己的见解，“每一个进入经济学界的新人都显示了越来越熟练的数学（和统计学）技巧，这就提高了运用数学方法的一般水平和可能性。”^①

另一方面，数量分析给经济学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引致了诸多的问题。每一个数学化表达的经济学原理或观点，都隐含着严格的逻辑假设，如不加以悉心地推敲和谨慎地解说，结果会把很明显的道理说糊涂——“吃力不讨好”大约成为数量分析的第一个过失。

① J. R. 沙克尔顿等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39 页。